

秦 味

厚重悠长的陕西面食

唐宋以后,面食逐渐成为关中人的主食,并且融入社会生活习俗的各个角落。在重塑陕西人生活习惯的同时,也因陕西人而变得千姿百态、气象万千。

面提醒着陕西人的一年四季。过春节不是饺子就是臊子面,图的是团团圆圆、长长久久。

大年初一,韩城人要拿枣馃馍去祭献天地神,华州人亲戚互赠大花梗馍、油帮帮馍和小花馍。正月初五为“破五”吃饺子“送穷”。正月十二晚“老鼠嫁女”,武功一带要蒸老鼠馍。正月二十要吃补天饼,补天补地。二月二龙抬头,长安人吃蝎子馍,长武人吃龙须面,中午还要吃龙鳞馍。清明节,韩城人要吃合子馍,华州家家蒸小虎馍、燕子馍、凤雀馍等。六月六看女,华州娘家人要给出嫁闺女送曲连馍,谷雨节家家要蒸祭神礼馍。端午节的十天,母亲给出嫁女送各式小花馍和“娃娃圈”,端午节,关中很多地方要给已出嫁的女儿送五毒馍。七月七夕巧节,华州的风俗要给孩子蒸“晒台馍”,给女孩蒸簪馍。八月十五



合阳面花“老虎花馍”。 行俊肖

中秋节,吃月饼吃汤圆,而华州地区在八月十五与九九重阳节要送的面花是“九座糕”。秋播结束吃清汤凉面。十月初一祭祖献馃饅。冬至家家户户吃饺子。腊月廿三祭灶,要做灶干粮献灶君。除夕吃面寓意来年财源滚滚。

面也记录着陕西人一生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在陕西关中,从孩子降生、结婚、过生日、走亲戚、祭祀等,都离不开面。在华州,婴儿出生三天,姥婆要送面塑小老虎。孩子过满月,送曲连馍,以臊子面为压轴的“流水席”也是不可缺少的。小孩周岁,元宵舅舅家送灯笼,灯笼上要挂鱼馍,家人则给做长面肉臊子。孩子长到十二岁,姥婆舅家再送虎龙“大谷卷”。孩子结婚,外婆、老外婆家第三次送虎龙“大谷卷”,姑、姨、舅家则送“高馍盘”的礼馍。在韩城,男方定亲时,女方送男方一对老虎饅饅馍,男方则回送女方鱼儿饅饅馍。结婚前一天,华州地区男方要送女方家去离娘馍,结婚时,婆家要将对面虎挂在新娘脖子上,女方要送男方鱼馍一对,女方亲友送各式大礼馍。老人祝寿有“大寿桃”礼馍,家人还会制作长寿面。老人去世则送祭礼馍,有单祭、双祭。女儿、外甥要送大礼,就是双祭,包括动物、花木、果品形状的64个花馍,然后在下葬前一晚献食祭拜。

在陕西,面就是社会风俗,就是人情世故,就是礼尚往来,面连接了乡土社会中的亲情友情,面也规范了乡土社会中

的乡约民风。

扯得再长不会断,扯得再薄不会烂,煮得再久不会糊,捞在碗里不会粘,吃在嘴里光又滑,嚼在嘴里筋道。陕西人爱吃面,会吃面,更会做面。做面先要和面,面水比例、加盐加蛋、醒多长时间、是揉是压、是搓是擀都有窍道。陕西的好面讲究薄、筋、光,核心就在揉,什么时候才算好,这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把面的脾气摸透了,就等于把长着脸面肚子的陕西人的秉性看透了。

面条像裤带,锅盔像锅盖,这是陕西八大怪中的两怪,怪就是特点、差异和区别,就是独一无二,显示陕西的面食厚重悠长、粗犷狂放。但为什么一定要把面条比作裤带,把锅盔比作锅盖,我猜想或许是在形象地比拟陕西面条又长又韧、锅盔又大又厚这些特点的同时,暗示它对陕西人的重要性:陕西人离不开面条,就像人生离不开吃穿。煮饭的关键在锅盔,做人关键在裤带。裤带不能短,底气不敢泄!

□田龙过

民 俗

紫 阳 民 歌 不 可 缺 少 的 文 化 名 片

陕南民歌,唯山歌最有名。而安康民歌,又属紫阳民歌最有名。

紫阳民歌是流传在紫阳县境内传统民间歌曲的总称,是陕南地区传统民歌中具有代表性的曲种。它语言形象生动,曲调优美动听,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和地方特色。紫阳民歌分为山歌、小调、风俗歌曲、花鼓八岔、号子孝歌和新民歌等十几个曲种。其演唱风格大多有着较强的抒情性、叙事性和舞蹈性,适于表演动作、表达情节,反映人物复杂感情。

劳动号子是紫阳民歌的基础,船江号子是劳动号子的内核。紫阳民歌中船江号子占有重要位置,风格粗犷豪迈,音调、节奏复杂多变,具有较强的生活气息。

风俗歌曲是紫阳民歌中流传较广的民间口头表演形式,其风格是即兴创作见啥唱啥,想啥唱啥。应该说它是紫阳人民生活习俗的歌曲,也是紫阳民间举行婚丧嫁娶等各种仪式时所唱的歌曲。

紫阳民歌藏量大,已经发现的曲目总数已达5000多首,编印成册的有800多首,体裁包括号子、山歌和小调几大类,其中又包含了社火歌曲、风俗歌曲、宗教歌曲、曲子等不同种类。

民歌靠口耳相传,被誉为“口碑文化”。在人类还没有创造出文字之前是这样,有了文字之后,仍然如此。民歌既有即兴性,又有变异性。同一首民歌,因为歌唱地点、时间、歌手的不同而大不相同,即便是同一位歌手,也会因其情绪变化而有所差异。

紫阳民歌的主要代表作品有《年年有个三三三》(郎在对门唱山歌)《送饭调》《江打渔人》《王二嫁嫂》《茶山情》《巴山汉水情》《紫阳茶歌》等。产生于明朝以前的《郎在对门唱山歌》,是一首原生态民歌。这首民歌歌词全部都是安康地区紫阳农村地道方言,“短命死的,发瘟死的,挨刀死的”是地道的陕南口头语,一般说自己晚辈、亲人,包括儿女、情人从另一个层面表现出来的疼爱,也就是说爱得不得了,才用这种语言表达方式。

《郎在对门唱山歌》这首山歌是陕南紫阳民歌之代表作,它的演唱也很有特色,先慢后快,结束时再慢,先唱后说最后再唱,时松时紧,时快时慢,加上是地方方言,越加强了民歌的陕南特色。将它与陕北民歌相比较,如果把陕北民歌比作是男人,那么紫阳民歌就是女人。陕北民歌粗犷、豪放,像剽悍的男子,紫阳民歌像山里柔情委婉、细腻、温润女人。

襄渝铁路小站那些缺乏文化生活,也没有电视。有电视也没有信号,收不到节目。初到巴山深处小站工区的人们,白天面对冷冰冰的钢轨和险峻陡峭直插云霄青山,晚上头顶一块布片大小幽蓝色的星空和周围黑黝黝的山。唯一能陪伴他们的只有进站的货车车轮咆哮传来刺耳的响声。

所以,那时歌声便成了人们排遣心中忧伤苦闷,释放心情的唯一方式。记得那时,我经常给报社投稿,每天都会翻当天的报纸。无意中看到一篇报道,是时任紫阳工务段中修队指导员、我的小学同学白凤华在向阳带领中修队年轻人自己动手平整活动场地,活跃职工文化生活的稿件。稿件中有一句话,到现在我还记得:“晚上夜幕降临,那边,平整好的活动场地上爱跳舞的青年男女在一块跳舞,这边,爱唱歌的人在活动室里唱歌,歌里自然少不了紫阳民歌。”因为向阳在紫阳境内,生活在歌乡的他们,受民歌的熏陶,自然会唱紫阳民歌。

如果说,民歌是中华民族音乐宝库中的一块瑰宝,那么陕南民歌就是这块瑰宝中的一颗璀璨夺目的宝石。去年新生代民歌歌手夏梅子应北京电视台邀请,将紫阳民歌唱进了北京。

“滔滔汉江水,巍巍秦巴山,秀美紫阳山水间,今朝更好看。”紫阳民歌清脆甜美,一腔唱出了一江情怀,喊出了满山厚爱。今天,紫阳民歌已成为紫阳一张不可缺少的文化名片,成为游客来紫阳旅游的一种艺术享受。相信随着外界对紫阳民歌的不断了解,紫阳民歌一定能够走出家乡,唱响全国,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高飞

鉴 藏

白 釉 盞 托



年代:唐

收藏单位:铜川博物馆

盞托,又称茶托,最早见于南朝。《资暇集》载:“茶托子,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鬚指,取碟子承之。既啜而杯倾,乃以蜡环碟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工匠以漆代蜡环,进于蜀相。蜀相奇之,为制名而话于宾亲,人人爱用,用于当代。是后传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

邢窑窑场位于今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临城县,是唐代北方最著名的白瓷烧造地,邢窑白瓷胎釉洁白,陆羽《茶经》说“邢瓷类银”“邢瓷类雪”。邢窑瓷备受世人喜爱,也由此行销天下。唐人李肇《国史补》记载:“内丘白瓷,唐虞,瑞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黄甜甜

下 马 陵 街 轶 事

胜 迹

下马陵街位于西安市和平门内西侧,西至柏树林南口。街北侧有汉董仲舒墓。下马陵得名之说法有两种,一说董的信徒到此皆下马,故称“下马陵”;一说汉武帝游宜春园,曾在此下马。

董仲舒是西汉有名的儒学大师。汉景帝时,董仲舒便来到京城长安,成了朝廷的儒学博士。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举献“贤良”之策。极力鼓吹“君权神授”,提倡“三

纲五常”,力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了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这在以后的中国文化思想发展上产生了极大影响。董仲舒去世后,汉武帝亲自为他选择安葬之地,并在陵前修建董子祠。出于对董仲舒的尊敬,据说汉武帝每次经过他的陵园时,在三十丈之外便下马步行,随从臣子照例这样做。从此便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骑马者,乘轿者,凡经过董仲舒的墓前,都要下马步行。下马陵的名称便由此产生。

唐人韦述在《西京记》中载:“蛤蟆陵本董仲舒墓”又曰“汉武帝至墓前下马,故曰下马陵”。据此可知,下马陵也称作“蛤蟆陵、蛤蟆陵”,估计这与关中方言有关。因为直到现在,“下马”与“蛤蟆”仍发音相谐。但蛤蟆陵又在何处?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有句:“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并未指出虾蟆陵在何处。另一位唐人皎然在《长安少年行》中也曰:“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矜。”只告诉人们那个地方是有歌妓的。宋昌大防的《唐长安城图碑刻》中称,虾蟆陵在胭

脂坡,位置大体在今交通大学东门沙坡村西的坡处。而元代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载:“兴庆池南胭脂坡大道东有虾蟆陵。”其位置大抵指在今西安东大东门的沙坡。据考,唐长安城东门(春明门)之内、兴庆宫之南史土确有一高坡,坡上有一大冢。这一坡地,古称“胭脂坡”,宋以后叫“沙坡”。按唐韦述所记,下马陵古址当在此坡。元代李好文《长安志图》中的《城南名胜古迹图》在这个位置仍绘有虾蟆陵和胭脂坡紧靠一起。只是到了明正德年间,下马陵才由胭脂坡迁至今址。 □贾怡

古 代 公 务 员 的 公 费 医 疗 待 遇

钩 沉

身份不同,各有定点医院
秦汉以降,医药事业不断进步,“医在王官”的制度日益完善。试以唐宋为例,作一个概观。

唐代的医药行政,隶属于礼部的祠部掌管,相当于中央卫生总署。另有隶属于太常寺的太医署,相当于中央一级的医学院,兼备医学教育和医疗组织两种功能,正如现在之医学院,必定有附属医院一样,医学生在医学院接受教育培训,同时参加临床实践,毕业后就有了提升做医官的资格。现在我们把有处方资格的人称作“医生”,就是从古代医学生参与治疗活动的传统沿革而来。

此外,翰林待诏院也拥有一批医术精湛的名医,大约可比医药研究院,这些翰林医官一般多去性质上属于宫廷医疗机构的殿中省尚药局轮值。宋代的医事制度,有所改良,医药行政转归翰林医官院掌理,太医局照旧沿袭唐代太医署的双重职能。此外,也有属于宫廷医疗机构的殿中省尚药局和御药院。

以医疗服务对象看,这些中央级的机构,各有制度划定的对口单位。如唐代制度,凡京师百署官吏、宫廷宦官宫女、南衙卫兵、各边疆民族驻京人员等,看病服

药,都找太医署。尚药局除了为皇帝姬妃、诸王公主服务外,禁军官兵的医疗也归它负责。

到了宋代,太医局除沿袭为京师官更、三学(太学、律学、武学)师生治病传统外,驻京各部队官兵统统划入其服务范围。其实中国自春秋以来,军队里都有医疗组织,假如在京军人去太医院看病,多半是部队医院未能治愈,向更高一级的医院求助了。

以上是宋朝官吏享受公费医疗的情况。地方官吏吃药看病,也是沾惠于这个“医在王官”体制。仍以唐宋为例,凡州府(宋时又加上“军”一级行政设置)一级,都设有地方一级医学院,其领导和教师,既是执掌地方医药行政的医官,又是传教医学生的导师,一般多为太医署毕业的学生。地方官吏及地方官办学校的师生患病,就请他们治疗。

一手抓医药,一手抓行政

县一级没有医学院,但也有县署机关医院。比如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记载的北宋制度,县一级的官医配置,是每一万户一至五人,遇缺即补。他们必须是太医院或地方医学院的毕业生,除了从事医疗活动外,还须负责采收药物、指导防

疫、验发医和开设药房的执照、处理医疗事故等一切相关事务。这种体制一直持续到清代。

这种县署医院兼医药行政管理的机构,一般多设在州县衙署的大门旁边,或者干脆就是县衙大墙的“破墙开店”,一方面承担县署官吏的公费医疗活动并受理医药行政事务,另一方面也为民众看病,乃至出诊,当然这就要收钱了。明代海瑞在任淳安知县时,写过一篇《兴革条例》,在“医官常例”名目下,有“医生四名”的记载。当时淳安县的壮丁名额约四千人,推算全县的户数,至多不会超过五万户。四五千户的小县就有四个官医编制,比起宋代,应该说有所进步。

穷人也能享受的待遇

《魏书》卷六载,北魏宣武帝曾发布诏令:“朕思百姓痛苦,民多非命……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家诊治,所需药物任医量给之。”后来魏宣武帝又命太医署,“于闲敞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住,严教医署,分府疗治,考其能否而行赏罚。”与北朝相对应,南朝齐也设有“六疾馆”,专门收治无钱疗病的穷人。

唐代前期,由佛寺创办的“悲田坊”和



孙温绘《红楼梦》张太医为秦可卿诊治图。

政府创办的“养病坊”并存,都是免费救治贫困患者的医院,后来悲田坊由政府接管,统一改称养病坊。据《唐会要》卷四十九载,这种收容贫民病者的公费医院,遍及九州郡,经费从指定的官田税赋中支出。宋承唐制,继续兴办这类能给贫民提供最低医疗保障的医院,完全由国家财政负担的“安济坊”,制度上要求各州县都设一所;此外又鼓励私人集资举办慈善性的医疗机构,叫“养济院”,政府在医疗人员和药物供应等方面给予支持。

这类旨在方便贫民就医、缓和社会矛盾的公费医疗制度,到元明时代还继续存在。 □完颜超元

高 照 听 : 真 正 的 儒 生 , 科 举 的 缩 影



高永堃书

高照听(高照听兄长)在国川书院讲学。

人 物

高照听(1842-1899年),后改照鑫,字晓峰,米脂举人,一代大师高照胞弟。他十五岁与其兄照煦上家塾,后考入国川书院,他当过书院的廩生,成为贡生后,也做过书院的山长,并成为学政熟知的名师。

国(yin)川,也称国水,是无定河在唐代以前的名称。北朝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只称“国水”,并无“无定河”之称。汉惠帝五年,曾置国川县,雍正

版《陕西通志》云:“国阴故城,在今米脂地。”“国水、国川、银川、银河,都是无定河的古称或别称。唐初历史学家、训诂学家、大学者颜师古认为,银川、银川,均由国水而生,“旧名犹存,但字变耳”。明弘治十七年,延安知府李廷寿主修的《延安府志》称米脂城名为“银川”,历史上因李自成而著名的“银川驿”,就设在米脂城;而艾氏宗谱就命名为《国川艾氏家乘》。可见,国川既是无定河的古名,也是米脂的代称。因而,

国川书院即米脂书院。

高照听在《闲谈笔记》中写道:“榆林镇刘厚基迫贼至米脂,询悉前后情形,甚夸米邑团防之善,并谓弟胆识过人,拟禀明上宪,酌情奖励,照例可以叙教职。弟谓:‘北城系余所守汛地,不能先事预防,致令阖城受惊。今幸获安全,私衷殊愧愧悔,乃反借此褒奖耶?’固力辞之。盖年少气盛,志趣远大。当作诸生时,厌此寒酸官。岂知八试秋闱,始登乡荐,六试春官,仍循例就教职,殁于咸宁学署。”可见,同治九年抗击回乱,高照听就可以因功获得教谕职位,但志趣远大的他,向往举人进士,辞去了这次褒奖。

可是,文人命蹇。“工书法,研究古今文辞,均有根底”的高照听,虽然每写一篇八股文,士子争相传阅,视为范文,但在考场上却一再失利。他从同治三年(1864年)开始参加举人考试,连考八次,直到光绪八年(1882年)壬午科,当考场点名点到“高照听”时,学政樊介轩为之起立致敬。一位进士出身的三品“学台大人”(清朝明文规定,各省学政必须为进士出身者方能担任,官阶为正三品)向一个参加举人考试的士子致敬,这在中国科举考试一千多年的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之所以有如此礼遇,也许为高照听“咬定书山不放松”的精

神;也许他此时已是全省闻名的国川书院和关中书院的教师;也许有感动,有激励,也有同情。这次,高照听终于考取第四名举人,成为“五魁”之一。但他并未就此止步,接着连续参加了光绪九年、十二年、十五年、十六年(恩科)、十八年、二十年(恩科)六次进士考试,都名落孙山。

有意思的是,他和他教过的国川书院学生高增融(高照听仲子,高照听继子)、李蘊华、高增爵、贺锡龄先后同场会试,后者相继于光绪十五年、十八年、二十年中了进士,而高照听都是落第而归。总计高照听参加了十四次举人、进士的考试,前后共三十一年。到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56岁的他重病在身,为了生计的“里子”,恐怕更为读书人的“面子”,只好出钱捐了个咸宁教谕,58岁即卒于署任。陕西巡抚端方,亲率省署五大宪前往吊唁,为一个小小的教谕,可谓史无前例。

他是国川书院真正的儒生。本来二十出头就可凭战功获得教谕职位,但他意在“科举正途”,谨记孔子积极人世、“生无止境”的教诲,为了自己的追求,屡败屡战,百折不挠。孰料命运弄人,到老还是终止于教谕。这样的宿命,真像逐日的夸父,其矢志不渝的精神,却是我们每一个求学者和文化人不可或缺的心性。 □秋实